

軍事動員模式的變遷：歷史趨勢與理論

郭盛哲

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軍事動員模式是一國如何將其人力動員以組成軍隊的過程。本文簡要地描述西方國家軍事動員模式變遷的歷史過程，並介紹解釋此一變遷過程的理論。西方國家在近代主要經歷兩次軍事動員模式的變遷，第一次是在十八世紀末期，由貴族式軍隊轉變成大規模徵兵制軍隊；第二次是從二十世紀中後期開始，由大規模徵兵制軍隊轉變為小規模專業軍隊。本文首先分別簡要介紹三種軍事動員模式的面貌。其次分別討論學者針對這兩次轉變所提出的解釋。在結論中，綜合上面兩個階段的解釋理論，本文提出幾個未來可能考慮的變項。

關鍵字：軍隊動員、徵兵制、募兵制、大規模軍隊、小規模專業軍隊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Mobilization: Historical Trends and Theories

Sheng-Che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organize the military, each society tries various ways of mobilizing people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This article is confined to western nations since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t wa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at aristocratic forms of military mobilization were first challenged by the appearance of a mass armed force. It was agai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mass armed force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an all-volunteer professional force.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three major modes of military mobilization, followed by introduci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wo 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nclusion, several possible shared variables are propos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ilitary mobilization, conscription, all-volunteer forces, mass armies, all-volunteer professional forces

一、前言

一個國家要動員自己的人民服役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牽涉到諸多面向，包括政體形式（民主或獨裁）、行政能力、財政能力、人民意願、外在威脅，每一個因素都牽動著動員的形式、過程與結果。正如美國軍事社會學家 James Burk 所言：「所有當代社會均動員人民服役。問題是如何辦到。」（Burk, 2006:111）本文的主旨在追溯軍事動員的歷史變遷趨勢並討論關於它的解釋。

戰爭始終是歷史的常客，人類歷史充斥著大小不斷的戰爭。社會學家並非歷史學家，並不刻意追求戰爭的歷史細節，儘管有時這也是有必要，但真正所感興趣的是戰爭背後所反映的一個龐大結構：在不斷變動的國際競爭體系下，國家根據它的優勢、資源、企圖，不斷進行戰爭準備，進而製造戰爭，並承擔戰爭後的影響後果。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有一個專門的組織完成這項複雜的工作：軍隊。

軍隊不可能無中生有，軍事動員方式成了這個過程中的首要關鍵。國家或統治者必須以它所做得到的方式，不管是暴力或非暴力、酬賞或義務、合法或非法，來動員群眾並加以訓練組成軍隊，而且通常是人口當中相當特定的群體：較年輕、體力較佳、主要是男性，而組織這些特定人口的機會成本相當高昂，因為他們都是原本經濟活動中生產力較高的一群。

要動員、組織並有效訓練這些特定群體從事作戰並非想當然爾之事，國家或統治者不外乎以兩種方式進行。第一個是創新（McNeil, 1982）。這些創新也許是組織的改革，也許是科技的進步，也許是戰略、戰術思想的改變，關鍵在於如何將它們化作為戰場上的勝利。第二個是模仿（Tilly, 1975）。一旦自身的創新在戰場上被證明有效，將迅速被他國模仿。如果是他國的創新，也很快被自身模仿。很快地，創新的優勢消失，各國又回到均勢狀態。因此除非持續不斷的創新，才能繼續維持優勢，或者迅速的模仿，才能持續追上、擺脫劣勢。不過每個國家的特定條件不同，模仿仍須根據自身條件加以修正，否則未必有利。修正帶來更多的創新，也帶來更多的模仿，如此不斷循環演進。誰能作出最適當的創新與模仿、最佳的資源配置、最有效的人力訓練與運用，便具備戰場上獲勝的先決條件，進而支配戰爭與和平的條件，不過很快又會進入另一個模仿並加以創新的循環，因此並沒有永遠的贏家或輸家。

軍事動員模式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觸及了社會學一個相當核心的主題：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角力。它也同時反映出近代國家之間複雜交錯的競爭與對抗：軍隊作為一個國家獨佔的暴力

工具，畢竟主要是用來與他國進行武裝的衝突，也就是戰爭（Tilly, 1985, 1992）。以十八世紀初期開始的徵兵制為例，透過徵兵方式將具有公民身分者納入軍隊從事軍事義務，對統治菁英而言是個嚴重的挑戰，因為它改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結構關係（Posen, 1993）。原本由貴族擔任的軍官轉變為由各階層來源的專業軍官，原本由雇傭方式的士兵，現在的來源則成為來自普羅大眾的公民，這等於是擴大各階級的政治參與。原本屬於統治者的政治資源，現在卻下放給普羅大眾。統治者也逐漸失去了軍隊作為鎮壓國內反抗勢力的工具。由於強迫人民服役的徵兵制必定不受歡迎，統治者必須要以某種方式讓人民心甘情願接受這個制度。

本文針對軍事動員的部分，檢視它的歷史變遷過程，並討論至今對這些變遷所作出解釋的理論。本文在第一個部分當中，首先簡要介紹在出現大規模徵兵制軍隊之前的戰爭與軍隊面貌，也就是貴族式軍隊的形式。其次介紹貴族式軍隊轉變到大規模軍隊的過程，接著是大規模軍隊轉變為志願役軍隊的經過。在第二個部分當中，依次介紹研究這兩個主要變遷過程的理論與研究。在結論當中，簡要地歸納幾個可以提供未來分析的面向。

二、軍事動員模式的歷史變遷

（一）十八世紀的軍隊與戰爭面貌

十八世紀的歐洲各國已經開始將它們的軍事力量擴及全球。由於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已經衰退，戰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歐洲大陸本身以及各國的海外殖民地。當時的法國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仍然是主要陸上強國，其次是普魯士與俄國的興起，衰退的軍事力量有西班牙、荷蘭與瑞典。

各國的軍隊在理論上是由選擇軍人作為職志的專業人員來擔任，但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是被強迫加入軍隊，施以嚴格的訓練，使他們成為服從性極高的軍人。軍隊反映了社會的階級現象，軍官大多數由地主、士紳與貴族擔任，他們的社會優勢地位使他們集中在騎兵單位而不是步兵單位。因此軍隊的組成是一種混合的形式，軍隊由貴族菁英擔任，至於士兵則是由貧農家庭的男丁或者四處漂泊的流浪漢所組成，比較專業的兵源是外國傭兵，一般也較受國王歡迎。這樣的軍隊模式，在歷史上一般稱之為貴族式軍隊，由貴族出任軍官凸顯出政治與軍事精英的整合，如此才能確保軍隊對國王的效忠，構成軍隊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利益共同體。

這段期間在軍事上並沒有太大的突破性發明，唯一較重要的創新是 1740 年

以後開始出現的輕裝部隊（light troops），在戰場上反應迅速敏捷，允許個人做自主性的判斷。輕裝部隊首先以不同的形式同時出現在兩個國家，一個是匈牙利的輕騎兵，一個是克羅埃西亞的輕步兵。由於它們在戰場上發揮效能，開始被其他各國競相採用。以普魯士為例，普魯士步兵在 1786 年佔了 5%，到 1800 年是 14%，到 1812 年成為 31%（Posen, 1993:92）。¹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英國更是將輕裝部隊獨立出來，成為菁英部隊。

戰爭並非是像前一個世紀的宗教戰爭一般要戰鬥至死方休，而是在規模上有所限制，對平民的傷害也減少了，不像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百姓受到重大的傷亡與嚴重的財產損失。由於經費與人力耗損仍大，兵源補充不易，軍事將領也盡量避免交戰，除非情勢對自身有利。作戰的方式極為嚴謹，完全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沒有個人置喙的餘地。這個情勢要到這個世紀晚期才逐漸改變。十八世紀前期較重要的戰爭有「大北方戰爭」（The Great Northern War, 1700-1721）、「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714）、「四方聯盟戰爭」（War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 1718-1720）、「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1748）；後半期比較重要的戰爭有三場：「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1763）、「美國獨立革命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法國大革命相關戰爭」（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91-1800）。

整體來說，這個時期的戰爭在戰術上極為呆版、充滿將領的個人色彩、花費極大、缺乏創新。較大型的戰爭經常是在各國交互聯盟、勝負往來當中，落得一個大人力與物力都耗盡、勝方也不過是慘勝、各國被迫中止戰爭並簽訂和約的結果，往往國際情勢很快又回到原先的均勢狀態。

（二）大規模徵兵制軍隊的興起

十八世紀末，兩個近代革命開始改變了原本以貴族式軍隊為主的軍事動員方式：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這兩個革命有效地將本國的公民動員起來，也就是透過徵兵的方式，組成一個大規模軍隊的形式。因為唯有透過徵兵制，才能在短期內徵召到足夠的大量兵源，更重要地，唯有徵兵制才能持續地補充大量兵源所需。儘管徵兵制有箝制人民自由的疑慮，剛好與革命所訴求的自由平等相反，但徵兵制在兩個國家的革命結束前終究都被採納實施。

美國獨立革命固然採用徵兵制，但是相對於歐洲國家而言，軍隊的規模仍然不算龐大，是由小規模的常備軍所組成，可以說是一種混合的過渡形式。對後來

¹ 這個時候仍然只是步兵比例的增加，普魯士在 1813 年實施徵兵制之後，整體軍隊的規模才大規模地擴張。

發展有比較重要影響的仍然是法國。法國大革命之後，從 1792 年至 1815 年，歐洲各國為撲滅革命火苗，不斷地聯盟起來進攻法國。此時法國軍隊出現了重大的改變，部隊不再是由貴族與傭兵所組成，而是從法國人民徵召而來。由於採取大規模徵兵，在面對各國的作戰中，兵源的補充較為充裕，軍隊也獲得後方人民精神上的支持，法國成為一個典型的「全民皆兵」（nation in arms）國家。²「法國大革命給了歐洲第一個現代大規模軍隊。」（Posen, 1993:92）

普魯士是第一個繼美法之後採取大規模徵兵制的國家。但是在初期並不十分成功。改革者認為徵兵制可以解決在拿破崙戰爭中，招募貴族式軍隊時出現的兵源短缺問題。他們也認為這是一個終結軍隊與社會之間隔離、動員國家與人民、追求國家理念的好政策。但是一直到 1806 年普魯士被拿破崙擊敗之後，改革者才說服國王與其他人接受他們的想法。到了 1813 年，拿破崙軍隊攻打俄國後慘敗，普魯士才得以自由進行改革，採取全國性的公民徵兵制，組成一個大規模軍隊。軍隊規模迅速擴大，軍隊從 1812 年 12 月的六萬人增加到 1813 年秋季的二十七萬人。在 1814 年實施的軍隊法更明定了採取徵兵制。

拿破崙被擊敗之後，各國並沒有立刻採取大規模軍隊的模式，一直到 1870 年之後才逐漸被採用。大規模軍隊短暫地出現在美國內戰期間的戰場上，但是獲勝的北軍在內戰結束後並沒有立刻採用大規模軍隊政策。只有普魯士持續維持一個建立在「廣泛且幾近全面公民徵兵制」的軍事體系（Kestnbaum, 2002:118）。最慢的大國是英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開始進行徵兵。此後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止，各國均採取以徵兵制為基礎的大規模軍隊型式。

（三）全志願役軍隊的興起

全志願役軍隊，或稱全募兵制，作為軍事動員的形式其實是相當近期的發展，在二十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逐漸出現在西方各國，而且一直要到冷戰結束後，這個趨勢才加速發展。相對於西方長期的軍事組織演進歷史，可以說是極為新穎的動員方式。

全志願役軍隊第一個重要的指標便是大規模軍隊的縮減。表一顯示北約組織各成員國從 1980 年至 2000 年的軍隊裁減比率。有三個國家（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的裁減比率高達 50% 以上，各國的裁減比率也分佈在 25% 至 40% 之間，只有希臘刪減比率較低，只有 12%。較為特殊的是土耳其，不減反增加了 8%，

² 法國於 1793 年通過《普遍徵兵法》（*levée en masse*），建立規模要比美國大得多的軍隊。整個國家被動員了起來：年輕男性赴戰場；已婚男性製造武器與運輸糧食；老年男性修繕公共場所與宣揚革命意識；婦女縫製帳棚與衣服、在醫院服務；小孩則將舊亞麻製成軟麻布。軍事效果非常突出。所有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未婚男性都能徵召得到，結果，到 1794 年法國軍隊增加到龐大的七十七萬人，給予法國在面對貴族式軍隊時人數上的優勢（Burk, 2006:114）。

主要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位於歐亞之間，有高度的外在威脅感，加上文化上認同大規模徵兵制軍隊所致。

表一：北約成員國的武力裁減（1980-2000）

| 國 家 | 1980 | 2000 | 裁減比率（%） |
|-------|-----------|-----------|---------|
| 比 利 時 | 87,900 | 39,250 | 55 |
| 荷 蘭 | 114,980 | 51,940 | 55 |
| 西 班 牙 | 342,000 | 166,050 | 51 |
| 法 國 | 494,730 | 294,430 | 40 |
| 丹 麥 | 35,050 | 21,810 | 38 |
| 德 國 | 495,000 | 321,000 | 35 |
| 英 國 | 329,204 | 212,450 | 35 |
| 美 國 | 2,050,000 | 1,365,800 | 33 |
| 義 大 利 | 366,000 | 250,600 | 32 |
| 挪 威 | 37,000 | 26,700 | 28 |
| 加 拿 大 | 78,646 | 59,100 | 25 |
| 葡 萄 牙 | 59,540 | 44,650 | 25 |
| 希 臘 | 181,500 | 159,170 | 12 |
| 土 耳 其 | 567,000 | 609,700 | +8 |
| 盧 森 堡 | 660 | 899 | +36 |

資料來源：Manigart（2006:332），並根據裁減比率高低重新排列。

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是軍隊當中徵兵所佔的比率，也就是義務役士兵所佔的比率。表二呈現了北約組織各國的資料。到了2000年，已有六個國家完全採用募兵制，其他尚未採用全募兵制的國家，其徵兵比例也是大幅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其徵兵比例不減反增，高達87%，同樣也是因為其特殊的國防安全考量。³

³ 土耳其地處歐亞交界，始終對地區性的衝突十分敏感。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強權奧圖曼帝國即是土耳其前身，因此軍國主義的歷史悠久。它的常備軍數量在北約組織中僅次於美國，數量高達一百多萬，實際上比 Manigart 所提供的數字還高。土耳其高度參與北約組織的軍事行動與聯合國的維和任務，它也參與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也派駐部隊於阿富汗協助美國的軍事任務。

表二：北約成員國武裝力量中的徵兵比率（1980-2000）

| 國 | 家 | 1980 | 2000 |
|---|----|------|------|
| 比 | 利時 | 26 | 0 |
| 荷 | 蘭 | 43 | 0 |
| 加 | 拿大 | 0 | 0 |
| 盧 | 森堡 | 0 | 0 |
| 英 | 國 | 0 | 0 |
| 美 | 國 | 0 | 0 |
| 葡 | 萄牙 | 60 | 13 |
| 法 | 國 | 53 | 20 |
| 丹 | 麥 | 34 | 23 |
| 西 | 班牙 | 67 | 31 |
| 德 | 國 | 45 | 40 |
| 義 | 大利 | 63 | 45 |
| 挪 | 威 | 72 | 57 |
| 希 | 臘 | 72 | 62 |
| 土 | 耳其 | 66 | 87 |

資料來源：Manigart（2006:334），並根據2000年比率由低至高排列。

綜觀這兩項指標，除了少數例外，歐洲各國均一致地走向大規模軍隊的縮減與全志願役軍隊的建立。事實上，目前這個趨勢仍持續進行當中。

三、軍事動員模式變遷的理論解釋

軍事動員模式變遷的理論，根據它們所探討的階段，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從貴族式軍隊到大規模軍隊；第二個是從大規模軍隊到全志願役軍隊。可能是因為實務上的需求較少與歷史資料分析的困難度較高，較少的理論著重在第一個部分的討論（Posen, 1993; Avant, 2000; Kestnbaum, 2002），比較多的討論是集中在非常近期的第二個部分（Janowitz, 1972, 1983, 1991; Van Doorn, 1975; Kelleher, 1978; Shaw, 1991; Moskos, 2000; Haltiner, 1998, 2006; Manigart, 2006），呈現文獻份量不平衡的現象。底下依序討論。

（一）從貴族式軍隊到大規模軍隊

1. Barry Posen 的模仿與國家主義的理論

政治學者 Barry Posen(1993)首先對這個議題作出較明確的因果闡述。Posen 將國家彼此模仿的概念作進一步闡述，他採取國際政治經常採用的基本假設：國際體系是一個無中央政權統御的競爭體系，各國都在密切觀察他國的軍事動向，一旦發現先進而有效的軍事組織、科技、作為，就會立刻模仿，他用「軍事模仿」(military imitation)一詞來形容這個現象。Posen 的另一個主軸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他認為徵兵制的前提是要有某種程度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該國人民對國家要有狂熱認同與愛國心，對於國家的強制要求都能認同與配合。

Posen 同意一般歷史上的看法，認為法國大規模軍隊的興起主要肇因於法國大革命後的革命政府需要龐大軍隊來對抗外國的反撲勢力，不過 Posen 進一步追溯到更早的七年戰爭(1756-1763)。在該場戰爭中，法國菁英從當中學到慘痛教訓，也就是兵源不足，導致被兵力小於法國甚多的普魯士所擊敗。只不過，真正的改革要等到後來的革命爆發後才有可能。

法國爆發大革命之後，法國建立徵兵制大規模軍隊，在軍事巨擘拿破崙領導下，一次又一次擊潰各國聯軍的挑戰。法國的大規模軍隊與散兵佈署的戰術給普魯士很大的衝擊。西元 1806 年在對抗法國拿破崙軍隊的第四次同盟戰爭中，普魯士在耶拿(Jena)與奧爾施泰特(Auerstedt)慘敗。這個結果給了軍事改革關鍵性的推手。普魯士開始進行教育與軍事的改革。教育方面，加強下一代的愛國心。軍事方面，同樣以建立愛國的人民軍隊為目標。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茲(K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便是在此時登場，與其他人共同主導改革。儘管常備軍數量受到拿破崙限制，但是仍可藉由「民防制度」，也就是短期的軍事教育建立後備部隊；工作表現成為晉升的標準，廢止羞辱性體罰，創立戰爭學院以培育新領導人才。

一直到拿破崙進攻俄國潰敗之後，普魯士終於得以自由進行全面性的改革。當中最重要當然就是 1813 年實施全面徵兵制。軍隊規模成長迅速，從 1812 年 12 月的 6 萬人，增加到次年三月的 13 萬人，到了秋季已經是 27 萬人。但是普魯士在隨後的 1831 年對波蘭戰爭、1848 年對內的動亂、1859 年對丹麥戰爭，軍隊都表現得不如預期。這個結果導致進一步的軍事改革，主要是增加兵力人數，延長服役年限，提昇軍官與士兵品質，到 1850 年識字率已達 80%，到 1866 年對抗奧地利作戰時，兵力已達 35 萬人，此時普魯士軍隊已成為一個強而有力、效忠君主的勁旅。

普魯士大規模徵兵制軍隊的初步驗證是 1866 年為期僅一個多月的普奧戰爭。普魯士和奧國為爭奪日耳曼統一的主導權而起爭端，戰爭在南、西、北三個

戰場同時展開，結果普魯士大獲全勝，雙方簽訂「布拉格和約」，戰後普魯士統一北日耳曼聯邦，確立統一德意志的優勢地位，奧國則退出德意志聯邦，國勢更趨衰退。

最終的驗證便是下一場的普法戰爭（1870-1871）。兩國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開啟戰端，在著名的色當會戰（Battle of Sedan）中，法國被普軍擊敗，損失超過十萬兵力，普軍進一步包圍巴黎，最後法國投降，雙方簽訂「法蘭克福條約」，普魯士統一德意志，成為歐洲一等強國。此時大規模徵兵制軍隊被證明為當時最有效的軍事組織，成為其他國家（包括法國）模仿的對象。

Posen 理論的兩大主軸，模仿與民族主義，分別代表國家外在與內在的因素，雖然兩者仍不免有些重疊。國家外在的國際競爭因素導致國家密切注意彼此的動向，一旦創新的軍事作為被證明為有效，便會立刻加以模仿與改良。而國家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民族主義，則是決定了大規模徵兵制軍隊能否持續存在的因素。

對於 Posen 的論述，Burk（2006）指出仍有功能論的弊病，也就是根據歷史的結果來詮釋之前的選擇，換句話說，普魯士之前的改革抉擇都被解釋為正確的、所以才會有後來軍事勝利的結果。照這麼說，普法採取大規模軍隊都是正確的抉擇。但事實上，法國初期的大規模軍隊仍然不穩定，拿破崙進攻俄國的失敗暴露出大規模軍隊拉長戰線後不夠靈活的弱點。其次，前文亦論及普魯士建立大規模軍隊的初期表現並不好。

Burk 對 Posen 論述的另一個批評是，他無法解釋在 1814 到 1870 為何只有普魯士採取大規模軍隊的模式。其實這個批評並不成立，因為 Posen 的論述當中已給了答案：普魯士的大規模軍隊還沒有得到戰場上實際的驗證。一直要到 1866 年的普奧戰爭和 1870 年的普法戰爭之後，普魯士的勝利才證明了大規模軍隊的優勢，各國才可能開始考慮採用大規模徵兵制。

本文認為這個時期真正的疑惑反而是為什麼普魯士在 1831 年對波蘭戰爭、1848 年對內的動亂、1859 年對丹麥戰爭中，大規模軍隊的表現不如預期之下，仍然持續做更進一步的改革，而不是選擇放棄、改走其他方式？

本文認為 Posen 論述的另一個缺失是沒有對民族主義作出區別。法國採取大規模徵兵是基於全國人民的熱情認同，是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因為當時法國面臨全歐圍剿討伐的危機，革命菁英抓住這個機會，實施全國徵兵，廣納各階層人民參與各種軍備活動。這種廣納各階層的軍事變革，也造成了社會平等的效果，打破君主專制的階級制度，符合法國大革命的精神。

相反地，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是一股由上而下的力量，是政治菁英主動發動軍事改革，採納徵兵制，並教育人民具備危機意識，發揮愛國心、為國效力，人民是站在被動接受的立場。政治菁英真正目的是打造一個忠心耿耿、效忠國王的軍

隊，作為統一德意志的武力，對內則是鎮壓叛亂。兩國如此截然不同的性質，使得大規模徵兵制與民族主義的單一連結性便令人存疑，民族主義應該是透過不同的路徑來影響徵兵制的實施。

最後，雖然後來各國陸續採用大規模軍隊，但是這並不是它們的唯一選項，就算如此選擇，它們理由似乎不全然只是模仿而已，而是有其特殊的國情因素。事實上，關於這點，在下一篇討論的文章當中（Avant, 2000），也做了相當深入的探討。

2. Deborah Avant：法國、普魯士、英國的三條改革路徑

美國政治學者 Avant（2000）摒棄了功能論的論述，並不直接根據歷史結果就認定大規模軍隊是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最佳選擇。她採取比較全面性的觀點，重新檢視當時主要國家在面臨做選擇時，所面對的內在與外在問題。首先，她認為每個國家在作出重大改變時，當時一定是有外在非常大的變化與壓力，例如新思潮的興起、市場變化或是軍事上的失利。其次，重大變革要能順利進行取決於國內的階級關係。如果這項改革不牽涉到支配階級的利益、或者各階級之間是分裂的狀態，就容易推動改革。第三，各國是在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全然相同的方式來達到大規模軍隊的形式，因此有其特殊的個別因素。她比較了法國、普魯士和英國，底下簡要分別介紹。

（1）法國

Avant 指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軍隊就已經進行改革，這是因為七年戰爭失敗的關係。但分裂的法國貴族對這些改革的意見不一，但是有一點取得共識：保留軍隊中的軍官團。法國大革命之後，革命掃除了貴族階級的障礙，公民與士兵結合的理念符合革命當中公民主權的結合，這時才得以大規模徵兵方式由公民擔任士兵。

（2）英國

對於英國，Avant 認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失敗還不足以刺激改革，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國內因素。英國的統治階級較為整合團結，軍事與政治菁英也持有共同的理念與利益結合，像是軍官身分可以用錢買到，但被認為不會損及軍事專業主義，反而被認為軍官的經濟利益跟國家結合在一起，這些因素使得全面改革聲浪不強。軍事改革侷限在教育、設立輕步兵、改善補給之類的技術改革，而不是根本的變革。

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仍然抗拒走向大規模公民軍隊，一直到 1870 年代之後才進行。主要有幾個原因：它在對抗拿破崙軍隊中表現不錯，事實上，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將英國的影響力長期發揮在歐洲大陸上。第二，它更關切於它的海外殖民地事業，往後軍隊的擴張仍然是靠傭兵。第三，國會遲遲不肯走向大規模公

民軍隊是因為它還沒有確定可以牢牢掌控軍隊。

一直到 1854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1855）以及隨後的印度反英革命（Indian Mutiny, 1857-1859），雖然英國都獲勝，但也都是慘勝。這給了改革聲浪的機會，特別是這個時候普魯士大規模公民軍隊的優勢已經在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展現出來。於是在卡威爾勳爵（Lord Cardwell）的領導下，開始進行軍事組織的改革。他移除皇室對軍隊的控制、將軍隊置於國會控制下。此時國會才同意將軍官職位的買賣廢止，並且建立以能力表現為基礎的軍官晉升制度。不過，士兵的來源是以自願為主，並不是徵兵制。

（3）普魯士

普魯士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並沒有建立公民軍隊的想法。普魯士軍隊在七年戰爭當中表現良好，王室無意改革。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一切就改觀了。普魯士在第二次反法同盟中被拿破崙軍隊擊潰之後，軍中的貴族軍官分裂成兩派，保守派與改革派，保守派主張懲處不勝任的軍官、提昇軍隊專業水準，改革派則主張軍事組織全面徹底的變革。後來改革派佔上風，組成「軍事重組委員會」（Military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推行各項改革，例如用考試選拔平民進入軍官團、提出徵兵制想法、取消軍中體罰制度。保守派反對建立公民軍隊，擔心成為反抗王室的力量，不過改革派在國王的支持下繼續進行，終於在 1813 年建立大規模徵兵制的公民軍隊。事實上，初期仍是雙軌同時存在，傳統軍隊仍然由貴族牢牢把持，但是由中產階級出身的公民軍隊軍官卻對軍隊有更深的投入。⁴

Avant 提供了一個相當具參考價值的比較表，呈現了三個國家走向公民軍隊的不同路徑。請參閱表三。

⁴ 關於普魯士的改革成功，有可能是較為特殊的案例，不容易在其他國家複製。前文在討論 Posen 文章時，有稍微提及普魯士是由上而下的菁英改革模式，非常不同於法國由下而上的普羅大眾改革模式。這個差異的確值得在他處作進一步的討論，社會學當中關於近代歐洲發展的歷史比較文獻或許可以提供未來分析的依據。

表三 法國、普魯士、英國的軍事改革比較

| 個案 | 先前條件 | 有否外來的衝擊？ | 國內的條件 | 結果 |
|--------------------------------------|---|--|--|---------------------|
| 法國 前拿破崙/拿破崙 時期的法國 | 物質與理念的 改變 | 有：七年戰爭的失敗 |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不同的利益 | 改革 |
| 普魯士 前拿破崙時 拿破崙/後拿破崙 時期 | 物質與理念的 改變 物質與理念的 改變 | 無 有：在耶拿與奧爾施 泰特被法國擊敗 |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不同的想法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不同的利益與想法 | 計畫，但是 沒有改革 改革 |
| 英國 前拿破崙時期 後拿破崙時期 1870 年代的英國 | 物質與理念的 改變 物質與理念的 改變 國際模式：普 魯士的公民 軍隊 | 有：在美國獨立革命 被美國擊敗 無 有：克里米亞戰爭失 敗，印度暴動 |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共享的利益與保守的觀點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共享的利益與保守的觀點 統治集團對軍事議題存在 不同的想法 | 小幅度改革 沒有改革 改革 |

資料來源：Avant (2000:50)。

近期已較少針對這個變遷作出討論的文獻，僅有美國社會學家 Meyer Kestnbaum (2002) 針對歐洲與北美徵兵制的誕生所做的分析。他指出，徵兵制的產生並不是政策上的突然轉變，而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事件交織的結果。他認為有三項歷史的動力：第一是全國公民權的出現；第二是根據公民身分強迫人民服役的國家政策形成；第三是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他認為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一些國家被捲入戰爭，程度嚴重到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政治與軍事菁英開始考慮動員一般的社會階級進入到軍隊中，這使得原本是受國王統治的臣民轉變成為國家的公民。

綜觀這個階段的討論，社會學還沒有提供很深入的分析，反而是政治學者運用許多歷史與社會學的素材進行相當不錯的研究。主要原因應該是大部份軍事社會學研究學者若是要研究軍事動員的變遷，多半將注意力轉向近期的變遷，也就是大規模軍隊轉變成全志願役專業軍隊，這也是我們在底下接著討論的主題。

(二) 從大規模軍隊到全志願役專業軍隊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歐美各國開始出現一股趨勢：逐步減少大規模軍隊的數量，並逐漸轉型為全志願役的中小型專業軍隊。這個趨勢到了冷戰後期更是加速進行。

美國的簡諾維茲 (Morris Janowitz) 與荷蘭的杜恩 (Jacques van Doorn) 兩位軍事社會學家是首先檢視這個趨勢的學者。簡諾維茲認為大規模軍隊的衰退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對於許多人，服兵役是「政治認同的行為」以及「普遍

國家主義的表現」(Janowitz, 1972:12)。范杜恩則是用簡要的數據，指出大規模軍隊衰退的現象可能已經開始，並討論此一趨勢的涵意(Van Doorn, 1975)。

簡諾維茲(1978)提出三個解釋原因。第一，兩次世界大戰造成鉅大的破壞，特別是戰後核子武器大規模毀滅的可能性，讓人質疑大規模軍隊存在的必要性，也因此質疑公民從事士兵的想法。在這個新情勢下，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持續動員的部隊，規模要比二次大戰時小得多，它存在的目的並不是要作戰，而是阻止大規模戰爭的可能。第二，生活富裕與教育程度的提高，改變了人們服役的意願。第三個是前面兩個原因所造成的後果，也就是公民對於「國家情感的稀薄」，取而代之的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與多元社會的觀點。

不過簡諾維茲和他後來的作品(1983, 1991)並非全然討論全志願役軍隊興起的原因，事實上，他真正關切的主題是西方民主政治是如何受到這個趨勢的影響，因為原本普遍徵兵制使得公民—士兵的身分結合在一起，服役的過程有一種公民教育的價值，但是現在卻因為停止徵兵而使得公民不再受到軍事的洗禮。

Kelleher(1978)是早期唯一針對這個議題的實證研究，目的是驗證簡諾維茲與杜恩對於大規模軍隊衰退的預測。她使用12個指標作為檢視的標準，訪問各個專家，詢問他們對於六個西歐國家(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瑞典)在這12個指標的程度高低為何，結果顯示西歐國家被認為在1970年代確實出現大規模軍隊衰退的現象。她很大膽地預測在1990年代，軍隊的規模會大幅縮小(可能高達30%)以及義務役軍人佔的比例更少許多(不超過25%至30%)。如今看來，這些預測都是正確的。

英國社會學者Martin Shaw(1991)則是從「軍國主義」(Militarism)的角度來觀察歐洲徵兵制的衰退。徵兵制可以說是體現一個國家「軍國主義」程度很核心的指標，而歐洲各國在廢除徵兵制的進展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在先進國家中，也只有歐洲維持徵兵制，在歐洲之外的先進國家，早已不實施徵兵制。Shaw稱德國是「最具敵意的古典軍國主義」，武裝力量強大，但是二次戰敗後的國防武力後被他國強力約制，也不能擁有核子武器。英法兩國則是相反，戰後是勝利國的身分，可以發展核武，但是英國已採募兵制，法國則仍維持徵兵制。Shaw認為，歐洲之所以一直存在徵兵制，是由許多因素所構成。第一是傳統與歷史，大規模徵兵制誕生於歐洲，一直斷斷續續持續到現在。第二，儘管已進入核武時代，歐洲各國仍認為來自陸上的威脅非常之大。第三，持續性的地區性衝突，使得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不但採取徵兵制，役期也最長。但是就未來的趨勢而言，Shaw認為歐洲走向募兵制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因為各國多數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自行獨立發展軍事活動的機會減少，加上快速發展的經濟與消費文化，使得大規模徵兵制軍隊不再是具吸引力的選項。

我們可以看到簡諾維茲與 Shaw 論述取向的差異，前者是觀察大規模軍隊衰退的影響結果，特別是對民主政治的影響；而後者則是檢視軍國主義的式微，如何造成大規模軍隊的沒落。

在美國軍事社會學家莫司考斯（Charles C. Moskos）的整合下，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軍事社會學者在 2000 年共同出版了《後現代軍隊：冷戰後的武裝力量》（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這本書的共同主軸是用 11 個變項來分析 12 個西方國家在冷戰後的武裝力量。跟本文主題較有關聯的有「威脅認知」、「兵力結構」、「軍隊任務」、「大眾對軍隊的態度」。跟以往論述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將 1945 年以後的西方軍事變遷再細分為兩個時期：1945 至 1990 的現代晚期（冷戰）與 1990 以後的後現代時期（後冷戰）。這三個時期在這四個變項上的差異可參見表四。

表四：三個時期的武裝部隊：以美國為例

| 影響變數 | 現代時期（冷戰前） 1900-1945 | 現代晚期（冷戰） 1945-1990 | 後現代時期（後冷戰） 1990 年以後 |
|--------------|------------------------|-----------------------|--------------------------|
| 威脅認知 | 敵人入侵 | 核武戰爭 | 次國家層級的衝突（如 種族暴力、恐怖主義） |
| 兵力結構 | 大規模軍隊、徵兵制 | 大型專業軍隊 | 小型專業軍隊 |
| 軍隊任務 | 國土防衛 | 支持盟邦 | 新任務（如維持和平與 人道救援） |
| 大眾對軍隊 的態度 | 支持 | 支持與排斥 | 漠不關心 |

資料來源：Moskos (2000:15)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兵力結構就是軍隊的動員方式與型態，在這裡可視為被解釋的依變項，而其他三個變項可視為解釋變項，也就是說，兵力結構是因為其他三個變項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以美國為例，1945 年之前，關切的威脅是來自國外的敵人入侵，主要的任務是防衛本國國土，大眾對軍隊也頗為支持，因此主要的兵力結構型態為大規模徵兵制軍隊。到 1945 年後，冷戰開始，威脅轉變為核武戰爭，主要的任務是與盟邦共同形成圍堵政策，大眾對軍隊的態度相當模糊，支持與反對兼具，也因此兵力結構轉變為大規模的專業軍隊。到 1990 年後，冷戰結束，所關切的威脅轉變為對世界各國（通常是較小或較貧窮國家）境內的武裝衝突事件，自身則是感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大眾對軍隊的態度轉變為漠不關心，兵力結構轉變為小型專業部隊，九〇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具體展現了近代高科技武器與專業部隊的作戰方式。

近期瑞士社會學家 Karl W. Haltiner 更新他稍早的研究 (Haltiner, 1998)，以實證資料驗證西歐十五個國家大規模軍隊沒落的現象 (Haltiner, 2006)。他發現西歐大規模軍隊的時代確實結束了，但不必然是單純廢除徵兵制的結果。各國之所以放棄大規模軍隊，主要是基於三項條件：第一，當一個國家加入某個國際防衛體系（例如北約組織），享有「安全優勢紅利」時；第二，當國家面臨國土明顯且立即威脅時；第三，當國家開始密集參與國際和平的支援行動時。最後他歸納出幾個整體趨勢：第一，西歐各國服役人口比例快速下降；第二，從冷戰結束前，各國的志願役人員的比例便逐漸升高；第三，大眾越來越不支持徵兵制；第四，全募兵制的結果之一便是女性服役比率增加。

比利時社會學家 Philippe Manigart (2006) 檢視西方國家武裝力量重組的因果關係。他從經濟、技術、文化、地緣政治和任務四個層面去探討它們對於武裝力量重組的影響。這篇文章特別之處在於採取鉅觀的結構因素觀點，也就是著重在大型的社會變遷趨勢對軍事組織所造成的衝擊。

觀察這些較近期的論述，Moskos (2000:15) 那張區分不同時期的表格，不斷地在不同的文獻中被引用，這樣的劃分似乎也被認為是合理而被廣泛接受。但是仔細分析，在 1945 年之後再細分為兩期的劃分，並沒有非常具體、明確的證據，充其量只是一個推測並不能算是一個定論。反而是 Haltiner 與 Manigart 的論述提供我們應該可以從哪些面向去觀察這個趨勢。

四、結論

本文簡要地回顧了軍隊動員模式的歷史變遷過程以及理論解釋。目的在呈現這個領域過去的成果與當前的進展。整體而言，這些研究具備幾項特點：第一，兩個變遷時期的截然劃分。除了文獻回顧性的論文之外，個別研究均選擇其中一個變遷階段作為對象。就限定研究範圍的考量而言，這樣做並無問題，可惜的是兩個階段的研究缺乏對話。這兩個歷史階段其實是長時間的連續變化過程，若是能夠有更長期的連貫研究，將更具學術價值。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第一階段的研究均是歷史的比較分析，應該是因為受限於資料與數據的可及性，不過歷史比較分析確實能夠提供獨特與寬廣的視野。第二階段的研究方法比較多元，各種量化的數據與調查、質性的訪談與歷史資料都被使用，這應該也是因為近期的資料較豐富也較易取得。

本文無意提出整合性的分析模型，此一複雜度較高的議題宜另行討論。不過本文確實注意到兩個階段一些共同的分析面向，此處僅能簡要列出，在未來的持續研究中將就這些面向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一）國家當時的國際體系環境與情

勢；（二）國家當時所面臨的外在軍事威脅；（三）國家當時的經濟與財政能力；（四）國家當時統治階級的能力與強弱；（五）國家當時軍隊的組織方式、作戰能力與科技水準；（六）當時被統治階級的串連與反抗能量。

最後，這些研究都是針對西方國家的討論，未來應當可以應用在近代中國或是戰後台灣的軍事動員變遷研究，討論其適用性與本國的特殊性。⁵

⁵ 兩位審查者均提及軍事動員模式可應用在近代中國、中共、台灣的案例上，例如一位審查者提及「中共的人民戰爭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府剿匪、抗日、勘亂（內戰）、侵台、懲越等戰爭中扮演什麼觀念？有什麼理論？」另一位審查者提及「台灣目前逐漸走入較小規模、低度軍隊動員的路程。而台灣的變遷對西方社會的經驗並不相似。」本文為避免失焦，並未深入探討這些議題，不過同意在未來的研究勢必要應用在近代中國與台灣的經驗上。

參考文獻

- Avant, Deborah. (2000). From mercenary to citizen armies: explaining change in the practice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1-72.
- Burk, James. (2006).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 In Giuseppe Caforio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pp. 111-128). New York: Springer.
- Haltiner, Karl W. (1998). The decline of the mass army in Western Europe.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5, 7-36.
- Haltiner, Karl W. (2006). The decline of the European mass armies. In Giuseppe Caforio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pp. 361-384). New York: Springer.
- Janowitz, Morris. (1972). The decline of the mass army.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0-16.
- Janowitz, Morris. (1978). *The Last Half-Century: Societ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nowitz, Morris. (1983).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Civic Conscious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nowitz, Morris. (1991).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lleher, Catherine McArdle. (1978). Mass armies in the 1970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5, 3-30.
- Kestnbaum, M. (2002). Citizen-soldiers, national service and the mass army: the birth of conscription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20, 117-144.
- Manigart, Philippe. (2006). Restructuring of the armed forces. In Giuseppe Caforio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pp. 323-343). New York: Springer.
- McNeil, William H. (1982).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Moskos, Charles C. (2000). Toward a postmodern military: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aradigm. In C. C. Moskos, J. A. Williams, and D. R. Segal (Eds.),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14-3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sen, Barry R. (1993).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120-124.

Shaw, Martin. (1991). *Post Military Society: Militarism, Demilitarization and War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 Doorn, Jacques. (1975). The decline of the mass army in the west: general reflecti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 147-158.

Tilly, Charles. (1975).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p. 3-8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169-1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投稿日期：98 年 10 月 14 日；採用日期：98 年 11 月 12 日)

軍事動員模式的變遷：歷史趨勢與理論